

北魏迁都前后平城的开发与建设

刘美云

摘 要 本文从鲜卑族拓跋部定都平城这一历史事件为出发点,说明北魏王朝对开发和建设平城都市,促进平城的农业、牧业、交通贸易等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研究这段历史,对加速今日大同及周边地区的建设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北魏 平城 开发 建设

一、北魏迁都前平城的状况

平城自古就是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杂居的边郡之地。秦汉时期,平城大部分属定襄郡。魏晋以后,平城先后成为匈奴、乌桓、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场所。这些少数民族对平城的开发建设是不容忽视的,其中较突出的便是鲜卑族拓跋部。

《魏书》卷一序记载:“……城盛乐以为北都,故修平城以为南都。帝拓跋猗卢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脩镇之,统领南部。”新平城位今山西山阴县岱岳镇。可以看到,在拓跋猗卢时期,平城就得到了一定的开发。383年,淝水之战中前秦败北。不久,拓跋珪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建北魏国。397年,北魏灭后燕,占有今山西和河北的大部分地区。次年,拓跋珪迁都平城,从此以后,平城从荒僻的边郡之地变成了北魏王朝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上重点经营的地区。平城进入了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时期。

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移民

开发和建设平城,首要解决人烟稀少、劳力不足的问题。为此,北魏向平城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其中人数较多,时间、地点记载比较明确的有下面几次。

1.《魏书》卷二载:391年12月,山胡酋大幡颓、业易于等率三千余户降附,迁入马邑。

2.《资治通鉴》卷一八载:396年6月,王建等三军攻广宁,斩后燕广宁太守刘亢泥,徙其部落于平城。

3.《魏书》卷二载:398年正月或1、2月,徙后燕山东六州民吏,徙何、高丽杂夷、百工伎巧四十六万余口^[1]以充繁峙、平城等地。

4.《魏书》卷二载:398年正月或为1、2月,拓跋珪所率六军灭燕后将生还者迁到平城。

5.《魏书》卷二载:398年7月,建都平城时将盛乐拓跋族部民由盛京迁入平城及其周围。

6.《魏书》卷二载:398年12月,徙后燕山东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平城。

7.《魏书》卷二,《资治通鉴》卷一一一载:399年2月,拓跋珪破漠北高车杂种三十余部后,俘获七万余口迁入平城。

8.《魏书》卷二,《资治通鉴》卷一一一载:399年2月,拓跋珪破漠北高车遗进七部后,俘获漠北二万余口迁入平城。

9.《魏书》卷二载:402年2月^[2]拓跋珪破鲜卑别种、破多兰部,尽徙其民平城。

从上述移民中所体现出的特点:

1.时间集中,次数频繁。移民活动早在迁都平城前七年就已开始,迁都前夕进入高潮,迁都当年人次最多,迁都三年后即不

再出现大规模的移民事件。由此可见,迁都之举是拓跋族经过较长时间考虑而决定的,每次移民的情况虽不一致,但充实平城、开发平城是其重要动机之一。

2.数量之大,史无前例。从迁入的人数分析,在391年12月迁徙中,若按每家五口计,三千余家合一万五千余人。据《魏书》卷二载,413年拓跋嗣阅兵,以奚斤为前军,统众三万,以拓跋熙等为十二将,各统一万骑,以此类推,王建等三军也应有三万人。再说,王建是北魏攻后燕主要将领,魏军出井陉攻中山时王建与李栗率军五万为前驱,时距王建攻广宁仅四个月^[3]。由此推测,王建等三军约三万人,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北魏以三万人攻广宁,则广宁守军亦应数万。据此估计,广宁之战后被迁人数不下万人。

以上统计是十分粗略的,因为还有不少移民或因地点含糊,或因情况不明而未被载入。如《魏书》记载,拓跋珪建都平城后有不少率部落、部属内附和内属者,以时间先后计,有郿城屠各董羌、杏城卢水郝奴、河东蜀薛榆、氏师苻兴、库狄部查亦干、后燕辽西太守李朗、西河胡帅护诺于、丁零帅翟同、蜀帅韩荅、慕容盛燕郡太守高湖、高车别帅敕力健所率九百余落、高车别帅幡豆健所率三千余落等。这些内附、内属者均无确切人数,但每部也总该有千人以上,则总计也有数万。从当时移民的潮流来看,多数应是迁往平城,应该加到总数中去的。由此可见,当时平城移民的数量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3.波及面广,成分复杂。从迁出地看,山胡酋大幡颓、业易于等原居地不详。周一良先生在《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一文中指出,山胡的“主要根据地一直是并州。尤以西河、离石、吐京、五城、正平、平阳诸地为多”。则幡颓等原居平城的南方或西南方;广宁郡治广宁,位今河北涿鹿县南,在平城的东北方。

以上统计为我们显示了一幅人们从四面八方迁往平城的壮观景象。在这一股股的人流之中,既有来自当时经济发展较先进的河北平原上的汉族人民,也有社会发展阶段比拓跋族还要后进的高车等游牧部族;既有自耕农、农奴、奴隶与氏族成员,也有地主、豪强、官吏、士大夫和奴隶主贵族。可以说拓跋族是在竭力将其新占地区的主要劳动力和技术力量以及其他人员向平城集中的。

大量人口迁入以后,拓跋统治者采取因人而异的办法。对于山东移民,其中的大部分被“计口授田”,给予耕牛,让他们从事农耕;少部分称为百工伎巧的手工业者被安排在平城等都市从事手工业劳动;少数汉族官吏和士大夫被吸收到统治机构里,这些人或者熟悉汉族的典章制度,或者具有丰富的统治经验与生产管理才能,他们都积极地为拓跋统治者出谋划策,成为他们统治和开发平城的得力帮手。

拓跋统治者对本族与一部分其他游牧民族实行了“离散诸都,分土定居,不听迁徙”的措施,将他们规定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从事游牧。至于对高车等比较后进的游牧部族,没有急于强求他们“离散”。在基本上不改变原有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各族移民

能够尽快地适应新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与平城原有的劳动人民共同担负起开发平城的历史使命。

三、迁都平城后社会经济的发展

迁都平城后,平城的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都迅速发展起来了。

1.农业。拓跋统治者很重视农业生产。他们不仅给迁往平城的山东移民“计口授田”,而且“躬耕籍田,率先百姓”,例:命尚书崔玄伯等“宣赞时令,敬授民时,行夏之正”。

拓跋统治者还注意农业生产的组织与管理工作。拓跋族虽然长期从事游牧,但在迁都平城之前,他们曾在盛乐“息众课农”,在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至固阳(今内蒙古固阳县附近)一带的河套地区屯田,从而积累了一定的组织与管理农业生产的经验。迁都平城后,对此更加重视了。平城地势平坦,桑干河支流众多,北魏时平城的水利资源较现今丰富,特别是桑干河上游南岸一带土质较好,适于农耕。由于各族劳动人民的辛勤耕耘,加上山东六州人民带来的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能,不仅大片土地被开垦出来,而且,很快就获得了丰收。据《魏书》卷一一载:“自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

2.牧业。拓跋族迁都平城以后,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层被规定在有限的范围内从事游牧,这样就保障了牧业的发展。迁到平城的牧民数量之多已如前述,他们是平城牧业发展力量中的新鲜血液。另外,拓跋统治者在不断的对外战争中掠夺了大量的牲畜。这些牲畜除王朝占有外,还大量地赐予功臣、贵族和官吏,从而刺激与促进了王朝与私人牧业的发展。在牧业发展中,尔朱氏部落的例子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尔朱羽健在拓跋珪时受封北秀容川(今山西朔县附近)方三百里从事游牧。其产业不断发展,到孝文帝拓跋宏时竟达到“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的程度,尔朱氏虽是在京畿边沿游牧的部落,但从这个部落的发展可以窥见一斑地看到平城周围其他部落牧业发展的状况。

3.都市建设。《魏书》卷二载:“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平城的建设与迁都是同时进行的。拓跋统治者对中原先进的文化十分仰慕。他们在建设新都平城时,就以中原的都会为蓝本。《魏书》卷二载: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以(莫)题机巧,征令监之。不仅采用邺城、洛阳、长安等中原名都的建制,而且参与建设平城的工匠也都是来自后燕旧都中山等地的“百工伎巧”。

关于平城的建筑物,据史书记载,拓跋珪时期平城已经有了十二座城门,还载有天文殿、天华殿、天安殿、中天殿、紫极殿、昭阳殿、西宫等建筑物的名称。关于这些建筑物的情况,无论从华丽的名称来看,还是从动用了数百万根木材来推测,都不会过于简陋。

虽然我们现在只能从几条零星的史料中去探究平城的景观,但是,从这些零星的史料我们也可以看到,拓跋珪时期的平城已远非昔日可比。而且,它还为以后的平城建设奠定了格局。

平城另外一个重要的都市是南平城,位今山西省山阴县桑干河南岸。《魏书》卷二(403)九月,行幸南平城,规度灞南,面夏屋山,背黄瓜堆,将建新邑。灞水即桑干河。黄瓜堆位今山西山阴岱岳镇附近,即前述猗卢筑新平城处。

南平城的位置便于控制陞北五县。附近土质良好,水资源充沛,为平城重要的农业区。因此,早在拓跋猗卢时代就已成为拓跋族重点经营的地区。406年,拓跋珪在南平城附近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魏书》卷二载:六月,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灞南宫,门阙高十余丈,引沟穿池,广苑囿;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

经涂洞达。三十日罢。据此看来南平城的建筑也是相当雄伟的。

都市建设是手工业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平城等都市建设的发展也是平城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4.交通和贸易。在交通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恒山直道的开通。398年正月,拓跋族将自中山北还,于是发卒万人凿山通道,打通了穿越恒山联系中山与平城的直道。恒山直道开通以前,平城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主要是两条途径。一条是沿桑干河往东到达幽州;另一条是自平城南下经并州往洛阳或邺城。这两条道路均悬远曲折,恒山直道开通以后,大大地缩短了平城通往中原的路程,并使平城与处于河北平原腹心位置的中山直接联系起来了。

恒山直道开通以后为北魏所作的第一项贡献就是输送了山东六州四十六万移民和由中山北返的十三万魏军。以后,恒山直道又不断修缮,并在平城与河北平原的经济联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商旅络绎不绝地穿越恒山往返于中山、平城之间,有力地推动了平城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

在平城周围地区,拓跋珪也在迁都后的第二个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以利于平城周围道路的通畅和平城内部贸易的发展。随着平城等都市建设和道路的畅达,平城的商业也日益兴盛起来,逐渐出现了“卖买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混杂”的状况。

北魏对平城的开发和建设为平城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在平城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由于平城的开发和建设是在北方地区自汉末以来战乱频仍、生产停滞长达两个世纪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它的意义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平城这一局部地区的范围。

首先,西晋末以来,我国出现了边远地区经济逐渐发展并赶上黄河流域的新局面。长江以南地区经济首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平城也及时赶上了这一潮流。

其次,四世纪末、五世纪初是北方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并发展的时代,平城走到了这一时代的前列。正因如此,它才能在将近一个世纪中成为整个北方的政治中心而在中国古代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最后,在开发平城的共同劳动中,汉族人民与北方各游牧民族人民通过生产经验与技术的交流而增进了民族感情,推动了民族交往,从而使平城成了一座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因此北魏民族融合的起点应该从迁都时算起。

参考文献:

[1]此四十六万为民吏、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与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之和。关于这次移民数字,除本表所列外,还有四处不同记载,《魏书》卷一一:“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北史》卷一:“人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万余口”;《册府元龟》卷四八六邦计部迁徙条:“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万余口”;《资治通鉴》:“吏民、杂夷十万余口”。上述史料中,《通鉴》不写百工伎巧但数字与《北史》、《册府元龟》相合,数据或与《北史》有关。《北史》与本表所引《魏书》卷二记载仅“万”与“署”一字之差而数字相差甚远,但二者均能说通。《魏书》卷一一中十万余家约五十万人,这与四十六万余口接近。

[2]魏书(卷一 三)为401年十二月,本文从《魏书》卷二。

[3]魏书(卷二)。

刘美云 山西大同大学雁北师院历史系 副教授
(责编 一溪)